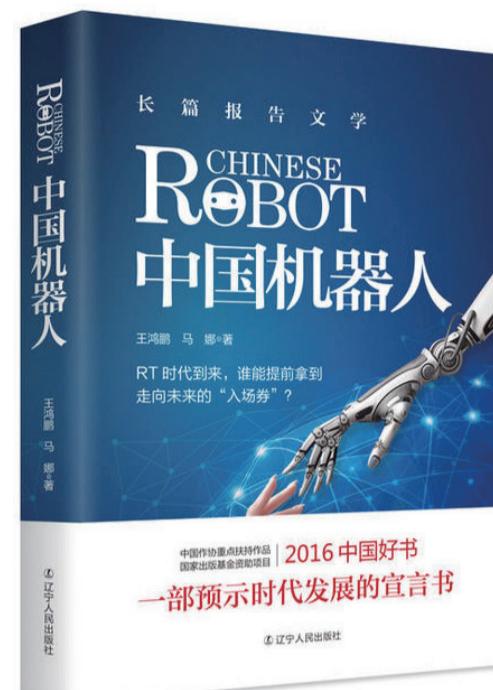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机器人》:

“另类”的科学家和“另类的人”

□李炳银



自从1920年捷克作家卡夫卡创作舞台科幻剧,创造性地推出了一个捷克语中称为“Robota”(农奴)的机器人之后,人工机器人这个“另一个人类”就在世界上出现了。后来,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机器人学三大定律”,因此被誉为“Robot”之父。1954年,美国人研制成功第一台可编程机器人,此后机器人在世界不少地方不断被创新和应用。2016年3月,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与“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五局大战,最后李世石1:4失败,这不仅将机器人的现实表现和未来可能性用鲜活地表现出来,也使人们对机器人的印象和理解关注更进一步。在这个机器人风起云涌的当下世界,中国的机器人水平成果及运用情况如何,自然也成了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对象。

就在此时,由王鸿鹏、马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机器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深入系统和真实描述中国机器人从开始立项到快步发展、如今跻身世界强国精彩内幕情形的作品,是一部揭示中国机器人研制创新及迅捷发展应用的文学史记,也是一个中国人自觉走进人工智能“王国”,以坚韧的意志和智慧的能力积极进取、努力创新,不断追求科技强国梦想并开出灿烂之花的实际见证。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需要一种现实的关注和前沿引导的实际姿态。两位作家选择这样包含新颖科学性和浓郁科学家精神情感性格的题材对象书写,表现着对国家创新成果和科学家迷人故事的兴趣,是文学有积极健康追求和引导的表现,很能体现国家坚毅前行的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机器人研制的时间相对较晚。1972年,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三人提出《关于人工机器人》建议报告开始,机器人的课题研究方才在中国正式登场。当这个建议和一系列研究课题提出的时候,中国的广大人们以至科技界的不少人们对这还是非常陌生。得知蒋新松他们要接触机器人研究,竟然有人说:“中国到处是人,都下岗了,你们还搞什么机器人呀!”“现在,国家在搞计划生育,连娃娃都不让造了,你怎么还搞机器人?”还有人不无恐慌地说:

但是,王鸿鹏、马娜在深入现场采访和用心收集阅读相关资料之后,以当下人物的在场行进作为和访谈内容作为明线延伸对象,又将中国机器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相关内容回叙穿插其间,作为重要隐性背景与真实存在同步推进,这样,就巧妙地在以往和现实的有序交叉纠缠与互助中,实现了中国机器人道路历史和现实状况的文献文学表达,使人们得窥全豹。这里体现着作家的写作用心,也使真实壮伟的报告文学对象得到客观的表达。

王天然、曲道奎、王越然等中国机器人的科学人生,是见证中国机器人历史的当事者、戏中人。他们是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的同事或学生,也是今天中国机器人研究发展推动的业中主将。两位作家正是在对他们的访问过程中,由他们及不少人的回忆和介绍,厘清了中国机器人的曲折发展历程,记述下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细节故事。蒋新松和他们自己,怀抱国家担当使命,勇于探索赶超世界科技前沿,精心潜研,尽心竭力,无私奉献,顺势而动,终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环境下图发展,没有使中国在机器人这个新时代背景下被科技浪潮面前掉队,为国家打造重器,赢得尊严,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向世界展示精彩中国故事,书写了人生与科学的华章。作品中记述了不少有关蒋新松人生和科学道路的情景,他自小接受母亲有关家国教育而树立的报国献身精神故事,他学业优秀却人生坎坷厚积薄发的情景,他勇于担当和殚精竭虑的科学性格行为,他乐意教育、热心培养新人的无私品格,他刚刚步向辉煌却不幸英年早逝留给人们的伤痛等很多情形,都让中国机器人事业打上了清晰的蒋新松的印记。作品中这些虽然不是作家现场观察面对而是由他转述的蒋新松的科学人生内容,或许带有理性的色彩,但由于内容本身的生动饱满而使人不时产生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富有文学的感染力量。

(《中国机器人》,王鸿鹏、马娜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王鸿鹏、马娜在深入现场采访和用心收集阅读相关资料之后,以当下人物的在场行进作为和访谈内容作为明线延伸对象,又将中国机器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相关内容回叙穿插其间,作为重要隐性背景与真实存在同步推进,这样,就巧妙地在以往和现实的有序交叉纠缠与互助中,实现了中国机器人道路历史和现实状况的文献文学表达,使人们得窥全豹。这里体现着作家的写作用心,也使真实壮伟的报告文学对象得到客观的表达。

王天然、曲道奎、王越然等中国机器人的科学人生,是见证中国机器人历史的当事者、戏中人。他们是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的同事或学生,也是今天中国机器人研究发展推动的业中主将。两位作家正是在对他们的访问过程中,由他们及不少人的回忆和介绍,厘清了中国机器人的曲折发展历程,记述下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细节故事。蒋新松和他们自己,怀抱国家担当使命,勇于探索赶超世界科技前沿,精心潜研,尽心竭力,无私奉献,顺势而动,终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环境下图发展,没有使中国在机器人这个新时代背景下被科技浪潮面前掉队,为国家打造重器,赢得尊严,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向世界展示精彩中国故事,书写了人生与科学的华章。作品中记述了不少有关蒋新松人生和科学道路的情景,他自小接受母亲有关家国教育而树立的报国献身精神故事,他学业优秀却人生坎坷厚积薄发的情景,他勇于担当和殚精竭虑的科学性格行为,他乐意教育、热心培养新人的无私品格,他刚刚步向辉煌却不幸英年早逝留给人们的伤痛等很多情形,都让中国机器人事业打上了清晰的蒋新松的印记。作品中这些虽然不是作家现场观察面对而是由他转述的蒋新松的科学人生内容,或许带有理性的色彩,但由于内容本身的生动饱满而使人不时产生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富有文学的感染力量。

(《中国机器人》,王鸿鹏、马娜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新知新思

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文学的“现场”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民国文学”的研究者主张还原历史现场,“重返八十年代”倡导者努力重返的亦是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然而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不论是“民国文学”的还原还是“重返八十年代”的重返,尽管可以不断去除历史的迷障,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用诸多材料搭建起来的终归仍是过往历史的模拟空间。王春林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体现出与上述研究者相似的现场意识和求真精神,但却是把正在进行的文学作为描述的对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现时存在的文学时空,是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一种“实时监控”与“同步记录”。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评论对象为2013年1月至2014年八九月间出版的或期刊刊发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涉除诗歌之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话剧等文学类。全书分11个单元,每单元设定一个主题,各单元所选作品依此各有侧重。为了能较为全面反映一个时段(基本以两个月为一段,与文学类双月刊的出版时距一致)的文学状况,也有一些与此主题有一定距离的作品。全书编排上的另一贯穿始终的线索便是时间线索,即各个单元中除个别作品因主题设定的原因有所微调外,所选作品基本以两个月为限,每个单元所涉作品基本都是两个月之内所出版刊发的作品,前述微调作品刊发时间上的前后延伸也基本在1至2个月之内。这本书的写作是以王春林2013至2014年间为《长城》杂志的“文情关注”专栏的写作为基础,全书中11个单元的排列顺序其实也即写作时间顺序的自然排列,本书可以说是对2013至2014年文学创作面貌与脉络的几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呈现。

王春林是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的坚持对当下文学发展状况进行追踪性研究的研究者。从本世纪初始,王春林每年都要写作一篇长篇小说年度发展态势分析的文章,多年下来,积有十余篇,依时序排列,俨然已是一部“新世纪长篇小说史”。《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写作则更进一步深入细部,作一种几近“近身肉搏”的研究,把文学发展态势俯瞰这样宏观的研究以一种更加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于他这样一种当下性与即时性的研究,王春林在本书后记中有这样的话:“我清楚地知道,在当下的高校内,有很多人并不把文学批评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只能建基于充分的文学批评实践上。倘若缺失了文学批评的充分支撑,一部理想的文学史的建构绝不可能”,因之对本书做了这样的定位:“希望以此而为未来的文学史写作做一种坚实的学术准备”。对于王春林的追踪式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这样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王春林虽然仍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文学批评,但其背后显然有着历史建构的意图,他往往是在文学史的高度与视野中审视与分析作品。本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努力:

首先是力求完整呈现某一时段的文学全貌。全书在各个有特定主题的单元中,除对与本主题相关的作品作重点分析外,也会涉及其他与本主题关系较疏但出版刊发于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如在“非虚构文学及其他”单元中,除对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窝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华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做细读式的详尽剖析外,还涉笔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而黑夜已至》等。“《空巢》《黑白》与布尔津的三重奏”一单元中主要是小说分析,但加入了舒晋瑜散文集《说吧,从头说起》的评论。

其次是书中有不少立足于文学史层面的对某些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比如对王蒙《这边风景》中的爱情书写,王春林认为“完全应该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感人最有诗意的爱情诗篇之一”。

再次是把作品置于文学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对其作分析与评判。王春林把五四以来白话文学史上的乡村叙事依时间顺序概括为五种,即以鲁迅及五四乡土作家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以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田园叙事,肇始于茅盾至“十七年”“文革”达到鼎盛的阶级叙事,“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中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为代表的家族叙事,晚近的以贾平凹的《古炉》、阿来的《空山》为代表的方言叙事。他先是用较长篇幅对这五种叙事形态的论述建构起文学史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中对作品作出评判。

最后是能超越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不虚美、不隐恶,超越个人的偏好对作家作品作客观冷静的分析,体现出一种史家的精神。对于这种追踪式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与作家同处一个时代,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要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样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非常不易。本书难得的地方在于即使面对当下活跃的知名作家,也能直言其作品中的不足,不为尊者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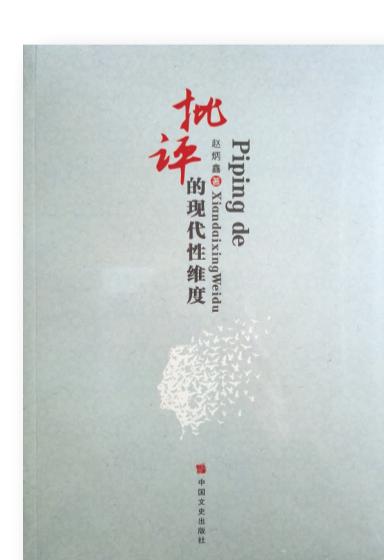
另外则是对自我立场自我艺术偏好的超越。王春林是一位多年来坚守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立场、作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对于蕴含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普泛悲悯情怀的作品有着特别的偏爱,即使对于不以再现现实为主要特征的非现实主义作品,王春林也往往会在挖掘其中的社会历史内容,阐释其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悲悯情怀一侧的内涵。但他又能超越自己的立场与视角,对作品进行多方面的审视,并不仅因某些作品在这些方面的突出呈现而予其简单的肯定。

其二,这种对文学的追踪式叙述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应该得到重视。研究界一直有当代不写史的说法,对于时间距离过小的历史的书写之所以不能成为信史,与历史书写者同其书写的歷史空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从既是自己生存空间又是书写客体的时空中超脱出来有关。但是拉开时间距离后,再逼真的历史还原其所恢复的也只能是模拟的历史时空。面对在时间之流淘洗中变得越来越简洁的历史,历史书写者可能更容易看见其“骨骼”、“脉络”,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失去丰富与鲜活的历史,离真相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拉开时间距离后对于过往历史的书写与当代写史相比之所以更被视为信史,其“信”度的提高未尝不与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被时间简洁化后对历史阐释的空间被窄化有关。从这个角度看,王春林的这种对实在的而非模拟的当下文学状态的现场书写,记录了许多正在成为历史的文学现实的细节,保存了更多的文学真相。况且王春林在做这样的现场书写时有着明显的历史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可以说是历史视野中的现场书写,它所记录的是更绵密、更具质感的文学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王春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卷絮语

批评的现代性维度之我见



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正式登场,我以为发轫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一个标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启蒙的话题再次被提及,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话题本身被遮蔽了几十年,这就使“现代性”成为当代中国稀缺的品质。

文学研究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走向深入。纵观中国的文学,其根本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我们根植于传统太久了,我们在古典的陈酿里浸淫得太久了,如缠绵难愈的老病,一遇异常的天气就会反复发作,而自己已经无法确诊了。康德说:启蒙就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真正人类的启蒙。理性的自由,那是人觉醒的必要条件。海明威说,写作就是写人的觉醒,或者说人的不觉醒。小说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要观察人在走向觉醒的路上在做什么。他

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

曾记得季羡林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傲视全球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世纪。而另一层意思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看,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这也正如邓晓芒所说的:“这是一个全人类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亿中国人展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纪。”它表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最为剧烈的‘化合反应’”。谈这个背景,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前的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尽管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中国目前处在几种社会形态共存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

我之所以要把“现代性维度”纳入我的批评视野,原因就在于

此。虽然我知道面对一些作家,有时对话本身就不对称,但我还是愿意去发现他们作品中的“现代性”因子。我以为批评家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此。作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没有自觉到的,就是要通过批评功能让他们意识到、自觉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承和践行的批评观。这本集子大致应该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当前文学思潮的看法和观点。这一部分量不多,但谈及的面比较广,涉及到当前的文化精神现象,这也是我多年学习哲学所得,可作为对当前文学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这也正如邓晓芒所说的:“这是一个全人类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亿中国人展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纪。”它表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最为剧烈的‘化合反应’”。谈这个背景,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前的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尽管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中国目前处在几种社会形态共存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

(《批评的现代性维度》,赵炳鑫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王晓瑜

现场的同步批评也是一种历史建构